

编者按

浓浓古诗情,悠悠文明韵。义乌自古山川秀美,物华天宝,造就了大批杰出的人才,创造了璀璨的历史文化,也吸引了不少名人雅士流连忘返。他们钟情于这里的山水,不吝笔墨为义乌留下了几多动人诗篇。  
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精华,它往往以凝练的语言,给人以启示。每当品读一首首令人心动的诗歌,就如同邂逅一位超凡脱俗的绝世佳人,总能让人沉醉在古诗词的唯美意境中,仿佛穿越了时空,与诗人共度那段悠远的岁月。  
为了再现义乌的山川之美,品味诗人笔下的悠悠情怀,就让我们跟着这些经典古诗词,循着诗人们的足迹来一场义乌文化深度游,感受诗人笔下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。

跟着古诗词游义乌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摄

苏溪亭,一个梦幻般的存在。它从唐诗中走来,见证了多个朝代的兴衰变迁,成了义乌历史上的一个文化符号。它一直在默默守护着行旅者的精神家园,见证了人们的喜怒哀乐,却早已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。黑格尔称建筑为“凝固的音乐”,诗意尽显的苏溪亭则如那天籁之音,可以带着你穿越历史的天空,飞扬的思绪飘向前世今生。

蝉鸣翠柳,鸟戏树梢,乘着徐徐清风,行走在苏溪之滨,便有一种别样的情怀,深邃而又旷远。溪流平缓,最浅的地方不过脚踝,不时吸引着孩子们来这里踩水嬉戏,妇女们则爱来这里浣纱洗衣;溪水潺潺,低声吟唱着那古老的歌谣。遥想苏溪当年,一座苏溪亭因戴叔伦的一首七言绝句而闻名遐迩。咏物抒怀,诗人在此留下情感印迹。且不论那倚栏人是谁,也不管谁在弹拨阑干十二曲,诗人笔下的风景是真美:亭阁清溪,春风燕子,芳草绿波,烟雨杏花……这不正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田园吗?

世间之大,莫过于一亭之间。单檐或重檐,长亭更短亭?虽然它早已消逝在了历史的长河中,但来过,就不曾离开。一座苏溪亭,那是许多文人骚客心中的无边风月,它以诗歌的形式,吟诵在历史文化的传承间,芬芳在人间烟火的光年里,玉立在历史深处的记忆中,一千多年来有多少人人为之倾倒。苏溪亭,一个诗意的名字,每当走进苏溪,心中便会涌起无限的激情与畅想,不信你听,那阑干十二曲的音乐又响起,似远还近,又倏忽即逝,余韵悠悠。那就请循着这穿透灵魂的音乐,跟随诗人的脚步,让我们一起去细细品味苏溪亭的艺术魅力。

门前溪水绿如“酥”

苏溪自古为交通要道,人员来往频繁。它下达县城,上通诸暨,地理位置优越。从县城过苏溪到善坑的官道,即可直通诸暨,故在古时,与诸暨交界的善坑便成了繁华之地。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地名善坑,自界至诸暨县治六十里。善坑系官路,铺递连络,行旅肩摩。前此蹊败不修,隘防不防,(知县)王廷曾筑工葺治,轮卒扼守,俾出途无困,伏莽自消。”

出行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。但古时囿于修路和造车技术,除了走“官路”,长距离交通主要还是靠水路,然后在不同水域之间由陆路转换。古时义乌的水运,除了义乌江(包括南江),就依托浦阳江;义北的,经浦江古塘到诸暨旺湾;义东北的,在苏溪、大陈顺溪至安乡入浦阳江,也到旺湾转船至临浦、杭州。

苏溪正处于浦阳江的上游,浦阳江的源头在乌伤县。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写道:“浙江又东,合浦阳江。江水导源乌伤县,东经诸暨县,与泄溪合。”在古代,一到雨季,溪水暴涨,洪水泛滥,桀骜不驯的苏溪,就变成了匹匹无端发怒的野马,水患几千年不绝。每逢犯浑时,山洪暴发,苏溪总要一反常态,身不由己,冲决溪堤,吞噬农田,撕裂桥梁,淹没村庄;风和日丽时,清澈的溪水灌溉着农田,成就了“五谷丰登”,哺育了这一方人。但这长流不息的溪流,更多地彰显温柔多情的一面,正如它的名字,

苏溪原名叫酥溪。“酥”是会意字,与禾、酉(代表酒)有关,字本义为酪类。古人常用“酥”来形容水,唐代韩愈曾写道: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宋代苏轼也以“微雨如酥”来形容。

因此,从字面上可以理解,古时的酥溪是一条多么温顺而美丽的溪流。义乌旧志书上对酥溪的解释是:“其水甘而腴,有类于酥”。另据清光绪《义乌山川胡氏宗谱》记载:“乌伤之西北有地曰酥溪,谓其水甘而腴,又类于酥也,或曰昔者有酥氏居住,故曰酥溪。”因为“酥”“苏”谐音,后来便演变为苏溪,既是溪名,又是地名,两者相得益彰。

苏溪之美不仅体现在水上,那清冽的溪水涓涓流泻,两岸风光更是秀丽宜人,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。苏溪古时盛产竹子,有“十里竹海”之称,苏溪源头的清潭山,最高处为“春风雪顶”,有石如鸟喙突出,称“鹰嘴岩”(鹰嘴岩后因修公路被炸毁),古人曾命此景为“青潭鹰啄”,名列古代“义乌八景”第二位。《万历义乌县志》卷之三对“苏溪”有记述:“酥溪,去县东北三十里,源出清潭山,至丫口与深溪合,入丰江(旧时浦阳江上游称丰江)。”另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箭山,县东北四十里,高三十丈,青潭山之东,横亘山源之口,山多竹箭,故名。”

苏溪风光秀美,不仅因为这“十里竹海”,这如“酥”的秀水,更因为有苏溪亭。据《嘉庆义乌县志》记载,唐代时,苏溪亭又名“溪上亭”,立于苏溪水中的石桥上。《康熙义乌县志》则有这样的记载:“溪上亭,唐戴叔伦留诗处。”至于唐时的苏溪亭在何时所建、建得何等模样?现在人们谁也说不清了。遥想当年,此地溪水悠悠,芳草萋萋,锦鲤游泳,亭台芬芳,有如此多姿多彩、风光旖旎的美景,怎能不令人心驰神往?加上这里又地处交通要道,人来人往,络绎不绝,自然也是吸引文人骚客的一个原因。

苏溪长流不息,从清潭山走出,一路向西,在冲向滴水岩山,经过了一番激荡之后北折,经大陈西北出县境。它一路奔腾,一路欢歌,再经浦江郑家坞、诸暨安华汇向浦阳江,最终汇合到钱塘江,滚滚注入大海。众多文人墨客经过苏溪时留下了经典诗词,刻录下曾经发生的过往,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。



清澈的溪水在流经滴水岩后北折,再经大陈西北出义乌境。

唐诗宝库留一席

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,强大的国力,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,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。在中国文学史中,唐诗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散发出绚丽的光芒。苏溪因着“苏溪亭”,有幸在唐诗宝库中留有一席之地。

“酥溪亭上草漫漫,谁倚东风十二阑;燕子不归春事晚,一汀烟雨杏花寒。”中唐著名诗人戴叔伦所写的这首《苏溪亭》,是一首七言绝句。不难想象,当大诗人戴叔伦行至此地,遇上了苏溪亭,自然是神思飞扬,诗短情长,在一番低吟浅唱中,挥笔写下了这首经典小诗,在义乌历史上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。

此诗首句写出了地点和节候,“漫漫”是无边无际的意思;次句写倚阑人的形象,“十二阑”指乐府古曲中的“阑干十二曲”;三四句写春光将尽,具体而婉曲地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深切思念,“燕子不归”是指远方未归的游子,“汀”指水边的平地。全诗四句皆写景,无边无际,不知不觉已到了暮春时节;苏溪亭外,是谁在东风吹拂中唱着阑干十二曲呢?燕子尚未回到旧巢,而美好的春光已快要尽了;迷蒙的烟雨笼罩着一片沙洲,料峭春风中的杏花,也失去了晴日下艳丽的春光,显得凄楚可怜。此诗不但描写了浓郁而迷蒙的暮春景色,更写出了那“倚阑人”清幽而忧郁的心情,诗韵人情,隽永醇厚而深婉柔美。

戴叔伦,字幼公(一作次公),润州金坛(今江苏常州金坛区金城镇南窑村)人。他出生于一个隐士家庭,年少拜唐朝著名学者和

文学家、常州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萧颖士为师,史称他为“萧门人之冠”。25岁时离家进京考取功名,位列“大唐十大才子”之九。大历三年(768年),由户部侍郎、盐铁转运使刘晏推荐,任湖南转运使(留后是指节度使等正员入朝时,由亲近之人把持当地事务)。唐德宗建中元年(780年)五月,出任东阳县长。

一首《苏溪亭》几乎出现在各个时期编撰的《义乌县志》中。但古《义乌县志》在介绍这首诗时,都把戴叔伦在东阳做知县写成了吴宁令,诗的题目写作《过酥溪诗》。如《康熙义乌县志》卷之十六写道:“水竹洞天,酥溪,唐贞元中,戴叔伦令吴宁,《过酥溪诗》……”实际上,当时的吴宁县已废,应为“东阳县”,诗的题目也非《过酥溪诗》,而是《苏溪亭》。在由崇文书局出版的《唐诗鉴赏辞典》中,就刊有这首名为《苏溪亭》的诗。

东阳建县前为“吴宁县”,取“吴地安宁”之意,至隋开皇九年(589年)吴宁县被废,唐垂拱二年(686年),析义乌县东冲要地及被废的吴宁县故地置县,名“东阳县”,今之东阳市称“东阳”之名自此始。另据沈约所撰《宋书·州郡志》的记述:“吴宁令,汉献帝兴平二年(195年),孙氏分置诸立。从隋开皇九年(589年)废吴宁,唐垂拱二年(686年)以义乌东冲要地及废吴宁故地置东阳县。”戴叔伦就任东阳县令的时间是建中元年(780年),此时县名显然已称“东阳”,而非“吴宁”。

戴叔伦任东阳县令时已近50岁。因受朋党之争牵连,任八品监察御史。戴叔伦调任东阳县令。当年他对任此职也是有情绪的,有他作答茶圣陆羽的《敬酬陆山人二首》诗为证:“党议连诛不可闻,直臣高士去纷纷。当时漏夺无人问,出宰东阳笑杀君。由来海畔逐樵渔,奉诏因乘使者车。却掌山中子男印,自看犹是旧潜夫。”

在当年,戴叔伦不喜欢赴任东阳也在情理之中。他到东阳时,东阳经过了浙东袁晁之乱及多起农民起义,民不聊生、田野荒芜。但他自幼受孔孟的民本思想熏陶,深知农民暴动是因赋敛和生活之困,于是在他上任伊始,便“缓其赋”“平其役”“简以惠下,信以怀志”,让人们休养生息,逃亡者返回家乡。他又提倡养蚕,号召种桑树;修水利,整顿堰塘;抑制豪强,对赋敛下重手。据唐御史中丞陆源在《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》中的记载,戴县令在东阳还大兴商旅贸易,流通财货,力倡教化,开办学校,“讲诵之声,闻于里巷”。于是人怀谦让,斗讼止息,“其俗则泰,其人则康”。东阳之境初步呈现安定富足的小康气象。

戴叔伦是中唐的著名诗人,才艺为世所推许,又是一位贤吏,一生为官“清明仁恕”,受百姓爱戴,所到之处,人民必记刻金石,载其功德。他任东阳县令三年,政绩显著,而在任东阳县令期间,也曾留下许多诗篇,其中《苏溪亭》一诗大约写于唐德宗建中二年(781年)仲春。当时,戴叔伦由东阳赴湖南去见曹王李皋(李世明第十四子李明的玄孙,天宝十一年册封曹王),在途经苏溪时,见江南温婉秀丽的晚春美景,即景怀人,有感而发,创作了这首诗,倾吐了自己对被怀念人的情感。

戴叔伦的诗多写农村生活,多表现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调,构思新颖,讲究韵味,体裁皆有所涉猎。其论诗主张是,“诗家之景,如蓝田日暖,良玉生烟,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”。他要求诗中写景要有韵致,有韵味,其中《江乡故人偶集客舍》一诗被选入《唐诗三百首》。

戴叔伦自任东阳令后,经三考于建中三年离任,又因唐代考绩多在岁末,故其离开东阳之时已在建中四年(783年)初。戴叔伦在离开东阳县,将赴湖南任职之时,东阳百姓依依惜别,这从戴叔伦的留别诗《将赴湖南留别东阳旧僚兼示吏人》可见东阳人民为他饯行时的情景。东阳百姓也没有忘记他的德政,在唐兴元元年(784年),即在戴叔伦离任的翌年,继任者卢习信顺应民心,为他立下《去思碑》作纪念。

戴叔伦在离开东阳后,先入湖南观察使李皋幕任职,这从《将赴湖南留别东阳旧僚兼示吏人》一诗中可以看出。由于当时李皋已调任江南西道节度使,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,在讨伐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之叛,所以戴叔伦去湖南并未成行,而是直接去了江西,入李皋幕任随军书记。兴元元年(784年),戴叔伦任抚州刺史;贞元二年(786年),罹谤受讯,不久雪谤;贞元四年(788年),戴叔伦为容州(今广西容县)刺史、容管经略使兼御史中丞;贞元五年(789年)夏,以病辞归,在返乡途中客死清源峡(今四川成都北),之后返葬于金坛小南门外县城南郊。



重建古亭唱和诗

苏溪亭因戴叔伦而扬名,苏溪也因他而大放异彩。苏溪亭不仅是一座名亭,更是一首流动的诗歌,一幅带有流动色彩的图画。此去经年,苏溪亭淡出了人们的视野,成了过往烟云,但幸而有唐诗使诗意永存。每当人们读《苏溪亭》,便会生发出一种沉郁的幽思,攫住人的内心,也引来历代文人墨客的相互应和。

南宋文学家楼钥,明州鄞县(今浙江宁波)人,隆兴元年登进士第,历官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、资政殿大学士。南宋乾道五年(1169年即金大定九年),他曾以随员身份、随舅父汪大猷使金,去给金国皇帝贺正旦(正月之旦,农历正月初一),并以日记形式,详细记录了从温州出发,经丽水、缙云、永康、东阳,途经义乌到北京的历程。在他的《北行日记》中写道:“(乾道五年十月)二十四日,行十余里入东阳县……溪行五十里,宿(大陈镇)余店,盖过苏溪八里矣。”楼钥在经过苏溪的时候天色已晚,也撩动了他的诗情,遂作诗《过苏溪》:“处处溪还舍,家家石累墙;有时逢老稚,无事只耕桑。野色撩诗思,村醪引醉乡;山川已如许,急雨更斜阳。”

明初宰相汪广洋,江苏高邮人,也可算是戴叔伦的老乡,元末进士出身。他也许是受老乡戴叔伦的感染,也许是被苏溪美丽的景色所吸引,在经过苏溪时,曾写诗应和,写下了一首《过苏溪桥》:“石磴盘盘卧湿云,山深瑶草不知春。马头忽见梅如雪,终有轻寒不着人。空谷无人响暗泉,隔溪茅屋见炊烟。东风故遣飞花出,知是桃源别有天。”显然,汪广洋的心境与戴叔伦是不一样的,在这里,让他感触到的是枝枝寒梅、淙淙溪泉、袅袅炊烟,还有这东风飞花,所看到的景象犹如世外桃源般美好。

元末明初,苏溪名人辈出。在《康熙义乌县志》卷十四“政事”部分有高信的小传:“高信,字克信,自幼好学,喜吟咏,见义必为。(至正戊戌)太祖取婺州,信与邑人胡璉、胡上运粮,以资军用。洪武十三年(1380年),应求贤诏,三人试中,俱授户部郎中。信居官勤谨有守,陈言立事多称旨,十四年,特升本部侍郎,晋尚书,赏赉加厚。十七年,以年老致仕,卒于家。”

在高信小传中提到的胡璉、胡上即是苏溪宅村的两兄弟,曾与高信同助粮佐明太祖。胡让住于讲岩书院,即今苏溪滴水岩之地,晚翠亭、积翠楼,就是他当年读书的环境。讲岩山的命名出处就在这里。滴水岩又叫水竹洞天,当年山上有秀竹叠翠,溪水中竹影摇曳,加上常年有水从巨岩上滴下,故又称滴水洞天。

胡璉为胡让之兄,字伯器,在洪武十三年(1380年)被授予户部郎中,后任户部侍郎。此任之前,即在元至正十七年(1357年),胡璉在家乡苏溪的讲岩山旁、苏溪之滨,重建了苏溪亭,旁植修竹,成清凉之地,亭曰“水竹洞天”。《康熙义乌县志》卷之十六对“水竹洞天”有这样的注释:“元至正十七年,胡璉筑亭溪滨,察俊士安(元朝官员,翰林编修)题其楣。”

胡璉重建其亭后,以存唐时之胜迹,遍邀文人雅士优游其中,吟诗作赋,在苏溪的“水竹洞天”举办了一场闻名遐迩的“文学沙龙”。这可是一场追慕古风、文人雅集的大聚会,“水竹洞天”顿时成了众诗人吟咏的对象,各地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,凡是有才能的士大夫经过这里,也会写篇诗文相赠,由此留下了许多精美诗文。

对于当时的情景,《崇禎义乌县志》卷之十九对“水竹洞天”有这样的记述:“国初(即明初),胡伯器结亭苏溪之滨,与诗人游宴赋诗。其诗数十首,都无俗韵。盖吴郡伯伯临、广信陈修、番禺程国儒诸子作也。宋承旨文为之记。”

唐肃,越州山阴(今绍兴)人,通经史、博学,国史编修官,与高启、王行等号称为“北郭十友”,又称“明初十才子”。唐肃的《水竹洞天》诗写道:“人间洞天三十六,谁到酥溪溪上头。湘水有人裁玉笋(同笛),武陵无地入渔舟。半泓龙起或成雨,六月夜来疑是秋。更有高楼名积翠,重重帘箔不须钩。”义乌人王初在《水竹洞天》一诗中写道:“亭外清流自激湍,绕亭都种碧琅玕。玻璃(同璃)光透轩窗冷,翡翠帘钩枕簟寒。稚子得鱼时下钓,道人斲笋巧为冠。敲金戛玉风来际,仿佛飞仙响佩环。”一场名家云集的大聚会就在苏溪亭畔精彩展开,为苏溪留下了诸多诗画佳作,也极大地提升了苏溪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

苏溪亭,一个延续苏溪千余年文脉的古老亭子,曾有多少文人雅士为之倾倒,吸引了各朝诗人在此吟诗作对。在明洪武十年(1377年)八月二十四日,苏伯衡曾专门写过《名亭辩》给予赞美,并与其之比作“真仙之馆”。

苏伯衡,字平仲,金华人,祖籍四川眉山,翰林院编修。他在《名亭辩》中写道:“义乌酥溪之上,胡君伯器之家在焉。伯器临流构亭,旁植美竹,因名其亭曰‘水竹洞天’。客或难之曰:‘洞天者,真仙之馆,以燕游之所方之,可乎?夫古人之名亭,尚其人者有之,即其地者有之,以其物者有之,寓其意者有之。若三十六洞天者,于亭何有焉?’”

“三十六洞天”是道教仙境的一部分,多以名山为主景,或兼有山水。道教认为此中有神仙居住,乃众仙所居,道士居此修炼或登山请乞,则可得道成仙。换言之,“洞天”意谓山中有洞室通达上天,贯通诸山。东晋《道迹经》认为,“五岳及名山皆有洞室。”所列十大洞名与三十六洞天一一对应。

苏伯衡将苏溪亭命名为“水竹洞天”,将据山溪之要的苏溪亭比作“真仙之馆”,其胜在何处?胡伯器没有直接作答,而是将此争论交给了空同子(明代文学家李梦阳的号)来回答。

空同子说:“若往应之曰:‘为洞天必在幽遐峻绝之域乎?……今吾酥溪,泉深而土沃,民皆安于耕凿,俗朴淳而有古风,又际时休明,盗贼屏息,物无疵疠,而吾之亭据山溪之要,会风气之绵密,水竹之清华,禽鱼之上下飞泳,复焉如在外世。行道之人触尘埃而冒风日,沿溪流而度阡陌,回望薨榭于苍翠之表,将以为何地。贤大夫士,行李东西,行过吾门,而吾延致尊上,与之寓情耳目之乐,旷思垒壘之外,讲论缜性修身之学,内王外霸之略,其人往往山泽之癯,列仙之儒,莫不充乎自足日相与群居,不犹真仙之与居乎?名以洞天,奚为而不可也?’”

将苏溪亭命名为“水竹洞天”,用空同子的回答便是“奚为不可”?苏溪溪水,自古流到今,淙淙不绝,就像一条玉带,飘荡在青山之间,虽历经沧桑,仍难掩汨汨文脉。行人漫步其间,跟着古诗词一起畅游,有诉不完的缱绻深情。其中的每一首诗,每一段背后的故事,都记录了历史曾经的片段,让人含英咀华,流连忘返。苏溪古老灿烂的文化,亦如历史长河之中的明珠,熠熠生辉。



苏溪之滨,风景秀美